

白云秋山霜叶血

海上谈艺录

黄宗英

姜金城著
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海上谈艺录丛书

白云秋山霜叶血

姜金城 著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目录 (CIP) 数据

白云秋山霜叶血 / 姜金城著. — 上海: 上海锦绣
文章出版社, 2012.2

(海上谈艺录)

ISBN 978-7-5452-1003-3

I. 1 白… II. 1 姜… III. 1 黄宗英 - 评传 IV. 1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4720号

“海上谈艺录”丛书获  资助

策 划 宋 妍 张晓敏

统 筹 沈文忠 倪里勋 徐明松

责任编辑 安志萍 张 原

特约编辑 孙建成 司徒伟智

封面设计 姜 明

技术编辑 李 荀 孙宗霄

丛 书 名 海上谈艺录

书 名 白云秋山霜叶血·黄宗英

著 者 姜金城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 (邮编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

规 格 787 × 1092mm 1/16

印 张 13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1003-3/J.635

定 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021-56477080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目 录

艺术访谈

在艺术的大海上漂泊	003
-----------------	-----

艺术传评

第一章 甜姐儿	023
第二章 幸福狂想曲	031
第三章 迎接黎明	039
第四章 在春天里	047
第五章 “浩劫”	054
第六章 归 来	063
第七章 上山下乡	068
第八章 巨星陨落	076
第九章 “赵丹遗言”	085
第十章 星	091
第十一章 大雁情	098
第十二章 小木屋的梦	106
第十三章 白鸽飞翔	116
第十四章 心 愿	122
第十五章 属云的人	129
第十六章 美丽的新疆	139
第十七章 童 年	147
第十八章 望长城	156
第十九章 天若有情天不老	163
第二十章 西藏情结	170
第二十一章 多梦的人	177

附 录

从艺大事记	189
后 记	197

艺术访谈



从小我没想当演员却当了演员，没想当作家却当了作家，80多年过去了，那是似梦非梦、比戏还有戏的生活……

——黄宗英

在艺术的大海上漂泊

时间·2011年7月17日

地点·上海华东医院东楼17楼病房

采访人·姜金城

被采访人·黄宗英

病房里很安静，很凉爽，感觉不到夏日的酷热。

窗外是蓝天，白云，7月的阳光……

黄宗英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本书——《听杨绛谈往事》。书页间夹着一些淡黄色的小纸条，可以看出，她看书总是看得很投入、很仔细。她那一头白发，那么亮眼，那么凝重，不禁使人联想到她所经历的那些风雪冰霜。她的脸上皱纹不多，但很细，仿佛再多的苦难、再多的坎坷，都只能在她心灵上留下深深的伤痕。她的眼睛还是那么明亮，那么有神，闪着善良、纯真、敏锐、聪慧的光芒。她的微笑还是和年轻时一样，亲切、甜美，使人感受到艺术家的青春远远超越了岁月与生命的局限。

病房的窗台很大、很宽，放着两大盆花，一盆蟹爪兰，一盆豆瓣绿。绿绿的叶片葱茏壮实，生机盎然。花盆旁堆着许多书，《2010年散文》、《岁月如斯》、《民国风景》、《当代美国获奖小说选》、《1949—2009报告文学选》、《刘邦前传》、《流离人生》、《在历史的天平上》……她看过的书，在笔记本上都会写下读后感，有的读后感就是一篇很精辟、很深刻的书评。

书堆旁，放着她的一张六寸黑白照片，那是她1982年10月第一次去西藏时，在大雪山上拍的。冰天雪谷的大风，把她的头发吹得很高、很乱，看到那飞扬的乱发，似乎会听到天地间风雪的呼啸……

小冰箱上，放着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授予她的“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报告文学奖”奖杯和第十二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授予她的“特别荣誉奖”奖杯。还有一个金光闪闪的大纪念章，那是为参加第一届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特制的纪念章。

安静的病房，为回忆、访谈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访谈需要穿越历史、穿越时空，需要真实生活的再现，需要心灵世界的袒露，需要思路清晰、反应敏捷、语言精辟、感悟独特，需要洞察时代、透视尘世、上天

入地、自由驰骋……就像骑上一匹神奇的骏马，在7月的大草原上飞奔！

啊，7月的大草原，是茫茫无际的绿海！

啊，艺术人生，是比真的大海还要壮阔的大海！

我们的访谈，就在黄宗英的病床边开始了……

我得到了上海这片文化艺术沃土的厚爱

姜金城（以下简称姜）：老黄，我们好久没有长谈了。几年来，您一直住在医院里，身体状况也不适合长谈。为了出好这本书，只好强迫您接受长谈了。

黄宗英（以下简称黄）：什么长谈，短谈，我们自己掌握吧。谈一次不行，就多谈几次。

姜：您接受我的“强迫”了？（她望着我，会心地笑了笑。）“海上谈艺录”丛书的策划者，是为了促进上海文化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催生出更多的优秀艺术家而编这套丛书的。每本书写一位上海的艺术家的，这样就会形成上海文化艺术的一张“名片”。其实，这是一项不小的“工程”，它的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都会体现在上海文化事业发展的史诗中。

黄：上海是一个久负盛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它的经济上的发展，都是以文化发展为基础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电影、戏剧、文学，在上海有了迅猛的发展，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艺术作品，涌现了许多杰出的艺术家。文化艺术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我很幸运，从我来到上海登上话剧舞台，就生活在黄佐临、吴仞之、姚克、丁力、丹尼、岱云、石挥、黄宗江、李德伦、异方、英子等艺术家的身边；后来，又结识了赵丹、陈鲤庭、章泯、郑君里、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陈白尘、徐韬、王为一、应云卫、沈浮、胡导等一批实力很强的艺术家。春去春来，我虽命运坎坷，却得到了上海这片文化艺术沃土的厚爱……

姜：是的。上海有独特的文化历史和鲜明的文化传统。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一个世界闻名的现代化的大都市，它的每一步进程都离不开城市文化的支撑。

黄：上海的文化风景线，就是一片民族文化的沃土。我深信，在这片沃土上会催生出更多的优秀艺术家和更多的优秀作品。

姜：老黄，您是1925年出生的。

黄：是的。今年86岁了。

姜：您16岁跟随您大哥黄宗江到上海演话剧，主演了话剧《甜姐儿》竟走红上海滩。那时，您感到突然吗？

黄：突然，非常突然。其实，我每天只是在认认真真地演戏，把每次上台当做第一次出台……

姜：听说，您演《甜姐儿》时，几乎每天都有人往后台给您送花。戏演完了，还有许多观众拥在后台门口，等着看“甜姐儿”。您紧张吗？

黄：开始很紧张，不知怎么对待。不过，那时我有大哥和剧团里的大姐姐、大哥哥哥们的呵护，渐渐地就不那么紧张了。

姜：您来上海以前演过话剧吗？

黄：没演过。我看过话剧，我特别喜欢看我大哥演的话剧，只要他上台，我都要去看。作为一个高中的学生，没演过戏，也没学过演戏，到了上海就一步登上了上海职业剧团的话剧舞台，断断续续竟演了大半辈子的戏。

姜：您年龄那么小，就和大哥哥、大姐姐们同台演戏，在台上可能很紧张……

黄：不。一进戏，我就非常放松、自如，觉得我是真的活着，活在角色中，反应也就特别敏锐。

姜：在您的演戏生涯里，谁给您的影响最大、最深？

黄：黄佐临先生。黄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没有黄先生当年的教导和爱护，可以说就没有我的今天。1941年9月，我追随大哥黄宗江到上海，进了黄佐临、吴仞之、姚克主持的上海职业剧团，未经考试就当上了见习生。一开始，吴仞之先生分配我登记道具和效果，可我连什么叫“道具”、什么叫“效果”，都得悄悄问大哥。没几天，黄先生分配我在台下提示洞口观看每个女演员的戏，随时准备上台代戏。记得是10月中旬，剧团的主要演员严俊和梅村要结婚，黄先生嘱咐我上台代梅村的戏，在话剧《蜕变》中演马科长的姨太太——“小的儿”。反正台词我都背熟了，黄先生也让演员们陪我走过台，我就大着胆子闯上台了，把台词一阵阵地往外抛……从此，我被黄先生认可，成为剧团的演员了。演话剧，演电影，写文章，当“牛鬼蛇神”……几十年来，断断续续一直下不了场。

姜：那时候，你们都很年轻。

黄：是的。我16岁，我大哥20岁，黄先生自己也不过35岁。

姜：上个世纪40年代初，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猖狂侵略中国的时候，国难当头，民族面临危亡，作为一个爱国、进步的剧团，你们的处境也是很艰难的。

黄：我记得清清楚楚，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上海沦陷，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上海职业剧团宣告解散了。卡尔登剧院外，墙上张贴的《凤娃》的大海报，随着呼啸的寒风飘落了。黄先生把演职人员召集到一起，说了许多话，可我只记得一句：“我们不做亡国奴！”剧团解散了，我和大哥在古巴路租借的小亭子间，被房东同整幢楼一起顶出去了。我们正愁没住处的时候，黄先生和丹尼老师夫妇邀我们兄妹与石挥一起，住进他们卫乐园的家，把我们三个人养起来了。要不是黄先生和丹尼老师收留了我们，我和大哥只能当手表、卖大衣过日子了。

姜：你们住在黄佐临先生家里，交生活费吗？

黄：为了让我们安心吃饭，安心读书，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黄先生让我们每人每月交8块钱的饭钱。我们心里都明白，这8块钱只能说是生活费的象征，何况我们没钱的时候还要欠着。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在山河沦亡的时刻，黄先生和丹尼老师是以怎样的魄力，怎样的心肠，把我们三个失业的演员养在家里！

姜：你们在黄佐临先生家住了多久？

黄：半年多。半年多是什么概念？要知道，思想的启蒙往往在一瞬间啊！人各有命，我就有这样的命，这样的幸运。

姜：过去您说过，在卫乐园黄先生家住的时候，你们还排过戏。

黄：是的。在卫乐园沉默了一段时间，看到日寇尚未直接插手话剧，恢复剧团演出有了可能，黄先生就在家中的客厅里，给我和大哥排戏。剧本叫《处女的心》，是黄先生根据苏联的原作改编的。后来，剧团恢复演出时，演了这个戏，改名叫《依发痴》，主要演员是黄宗江、我、张伐，观众很喜欢这个戏。

姜：不少记者都问过您，童年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您总说是爸爸和大哥黄宗江。您爸爸病故时，您只有9岁，您大哥离家时，您才15岁……

黄：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温馨的家庭里。爸爸是电话局的总工程师，却是我们孩子的好朋友。他回到家里，总是没大没小地撺掇我们上树爬墙，还拿他当大马骑。我们在学校里开同乐会演戏、唱歌、演讲、跳绳……他都是最佳观众——“追孩族”。他早上9点上班，可天不亮就起来，笑咪咪地看着我们一个个背着书包走

出家门，才又去睡回头觉。我小的时候长得最难看，他就最疼我，老让我跨在他背上骑大马，转圈圈。爸爸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我们家从北平带到青岛去的王厨子得了败血症，暴卒于医院。爸爸说他是为我们家而死的，出大殡时爸爸披麻打幡，我们全家白衣送丧，厚葬他于当地德国公墓。谁善待过我们家，我们都不会忘记。

“七岁看大”，这句话对我正合适。我仿佛从未逾越过“家庭熏陶”这个圈儿。大哥黄宗江把痴迷于戏剧艺术的圈儿给我套上，我也就收下了。我16岁追随大哥踏上话剧舞台，只因父亲早亡，家道中落，孤儿寡母日子过得凄清，我小小年纪整天做着养家孝母供兄弟上学的梦。我和大哥从小就特别要好，他老是干些我想不到的事儿，我最疼他。他13岁在青岛上中学的时候，就和同学李普在萧军主持副刊的《青岛日报》上编周刊《黄金时代》，文字是他和李普两人全包。他在学校里演话剧，我就得帮他筹备服装，走街串巷。他去海外当水兵，我就替他承担长子赡养母亲、扶持兄弟的责任。青少年时期，我们从不谈心，却彼此了解、笃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兄妹的感情越来越深。在坎坷的生活遭遇中，大哥北京的家是我温暖、亲切的港湾。可是，我的大哥走了，永远地走了。从此，我再也见不到大哥了……

姜：宗江老师身体一直挺好，除了听力差些，很少生病。去年夏天，他还在电话里问我：“给你寄的书收到没有？我给小妹的新书《百衲衣》写的序你一定看了，怎么样？有什么意见？……”想不到，10月初北京的朋友告诉我，他在医院里突然病危了。当时，我都不敢告诉您。

黄：我大哥是有才华、有业绩的艺术家。年轻的时候他演戏，都说他是好演员。导演喜欢他，同台演员喜欢他，观众更喜欢他。后来，他开始写作，写电影剧本、话剧剧本、戏曲剧本，翻译剧本，还写散文，他的散文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真是才华横溢，满纸芳馨。我还想不起比我大哥更有本事的本行专家。我本来以为，自己病病歪歪的，会走在大哥的前边，他会写一篇文情并茂的“祭妹文”祭我，没料到他竟先我而去！

姜：我们的谈话太沉重了，换个话题吧。最近几年，您因病一直住在医院里，虽然不断有作品在报刊上发表，可有些朋友还是关心地问我，黄宗英长期住在医院里，会感到孤独吗？我说，她生性随和，交友广泛，对人热情、真挚，亲友们都说她人缘好，可是老了，又有许多病，基本上以病房为家了，身边是冷落了许多。只要病情稳定，没有大的痛苦，她就读书，看报，写作……会不会感到孤独我还真说

不清楚。

黄：我喜爱孤独。孤独是我奢侈的享受，是我热闹一生的补偿。无论在家或在医院里，只要没人对着我说话，只要我的健康状况还允许，我就可以在别人宾客来访、电话嘈杂中，看我的书，写我的字。我认为能欣赏孤独的人，是有福的人，是心态年轻的人，是善于思索的人。孤独，是创造性活动的重要环节。孤独有助于思维的内在整合。孤独时把自己化为流质，融化在透明的封闭的玻璃仪器里，让千思万念像沸腾的水流，五颜六色、奇形异状，交叉、对决、选择、过滤、沉淀、结晶、醒悟、升华……进入一个新的思想境界，于是繁琐小事看开，大事不糊涂。晴天也好，雨天也好，依然能倾听到群众心声的脚步。孤独对我来说，从来不是单纯负面的词语，我真心实意地喜爱孤独！

姜：您的儿女都在国外，前些年您还能去探亲，如今，只能等他们回国来看您了。您外孙女小简尼大学毕业了吧？我老记着她小时候的情景，我还抱着她照过相哪……

黄：孩子们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他们都是地球人，打电话来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是问：“在哪里？”他们常常抱歉地说：“不能到医院来陪陪你。”我总是笑呵呵地说：“你们忙着我就高兴，有好心的保姆小琴在身边，不用你们陪。”

姜：您的两个弟弟——黄宗洛和黄宗汉都在病中，最近还好吧？

黄：他们病情都还稳定。我牵挂他们，他们牵挂我，我们就这样病病歪歪地相互牵挂。有时在电话里说说话，也就挺满足了。

姜：你们小时候在青岛住过，还记得住哪儿吗？

黄：1932年，我7岁。爸爸从北平调到青岛电话局任总工程师。当时我大姐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二姐在济南齐鲁大学读书。除了她们俩，我们全家——母亲、大哥、二哥、我、大弟、小弟、厨子王师傅、小脚李妈、老张妈都去了青岛。我们住在龙口路2号。院子很大，分前院、宅院。宅院铺了石子路，在西墙根我们种了许多草花，不需多伺候，就会开出漂亮的花。爸爸买来了大狼狗大利、小狼狗吉利，帮我们看家，还请人给它们盖了间板屋。大院子里有一棵丁香、一架葡萄，还有高大的枣树、榆树、杨树……有时我做梦，还会梦到青岛那个家。

姜：您当演员的时候，演过许多话剧，《蜕变》、《甜姐儿》、《鸳鸯剑》、《楚霸王》、《豆蔻年华》、《日出》、《家》、《春》、《秋》、《大团

圆》……还记得哪出戏演的场次最多？

黄：黄佐临导演的《蜕变》。这个戏，连演了200场。为了庆贺，剧团给每个演职员发了20元的花红。我是见习生，发给我10元。我觉得自己好阔气，赶快去买了个5磅的热水瓶。天气马上冷了，免得一趟趟去老虎灶买开水。我还狠狠心买了个枕头，我一直拿自己的衣服包当枕头。我真是成了最阔的穷人，最穷的阔人！可是，我们高兴了没两天，《蜕变》前台票房的小窗口，突然被两条打着红方印的封条封了。大伙全愣了。在后台，导演黄佐临却严肃地说：“封了《蜕变》，是我们的光荣！”戏不能演了，黄先生带着我们全体演员到大门口，向支持我们的观众表示谢意。

姜：无论什么年代，无论什么社会背景，好心的观众都是热情地支持艺术家的。他们的支持，是动力，也是鼓舞。我相信，忠于事业、追求希望的艺术家的，是不会被忘记的！你们一大批艺术家，是从旧社会跨入新社会的。解放后，面临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强调艺术家要为工农兵服务，要求艺术家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那时，您是怎么想的？

黄：解放了，欢天喜地地迈进了新社会。就像迎着晨光的小鸟，展翅飞上了辽阔的天空。党说要为工农兵服务，我们就热烈拥护。党说要改造自己，我们就决心改造自己。那时，在思想上很单纯，很幼稚，怎样改造自己？怎样为工农兵服务？并不那么清楚。以为拍工农兵题材的电影，演工农兵题材的话剧，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以为去工厂、码头、农村、军营演出，就是为工农兵服务。至于“脱胎换骨”的改造，真是日思夜想的课题。只恨找不到一个有效的方法，一下子把自己变成“工农兵”……

艺术家的人生，就是他的艺术

姜：解放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等一些知识分子，都成了“革命”的对象，成了必需“改造”的对象。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几乎都成了“牛鬼蛇神”，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只能屈辱地承受“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罪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一直没有变过，可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干扰和困惑那么多。艺术家总期望有一个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天。

黄：在“十年浩劫”中，人民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却只能看到八个样板戏。回顾历史，面对今天，我们应该汲取这样的教训。我在日记本上写过一句谚

语：插柳不叫春知道……

姜：最近，有不少人在报刊上谈人生和艺术，有些谈得比较肤浅，有些谈得深刻，让我激动与醒悟。这真是一个永远值得研究的大课题。

黄：世间万物皆可分，唯有人生和艺术不可分，艺术家珍惜生命，因为他还有许多未圆的艺术之梦。而一旦艺术要求他为之献身，艺术家则不惜生命。当人生中碰到悲苦、挫折、危难时，我思忖：直面人生的苦难，是艺术家可遇而不可求的“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吃得饱饱的”可以强化认识社会的广度、深度和力度。而人生中的喜悦、爱情、友谊、亲情是艺术的营养钵。人无志则艺术失魂！艺术家的人生，就是他的艺术！艺术家的生命，在他的作品中！

姜：这么说，您的艺术，就是您的人生？

黄：是的。我是一个极普通的艺术家，我的艺术在过去、现在、将来，永远都是我的人生。我珍惜我的读者和观众，把我当成他们的女儿、姐妹、长辈，他们接受我的文笔和角色，像接受自己的亲人，绝不止于接受艺术作品本身。

姜：说起来也真有意思，赵丹和导演陈鲤庭在朋友书桌的玻璃板下，看到了您演《甜姐儿》的剧照，就被您那双纯真、明亮的大眼睛吸引了。于是，便决定邀请您拍摄电影《幸福狂想曲》。想不到，在拍片的过程中，赵丹竟悄悄爱上您了……

黄：那是1947年的秋天。当时我22岁，阿丹32岁，他已是名气大的电影明星了。1948年1月1日，没刊登结婚启事，没办喜酒，也没拍张结婚照，我就成了阿丹的妻子。当时，舞台和摄影棚占去了我大部分的时间，家里还有赵青、赵矛两个孩子要我照顾。社会上只知道我是一个电影明星，其实我还是一个妻子，一个年轻的母亲。我既然钟情于阿丹永远天真的正义感和不怕艰险的勇气，也就无悔于跟着他大起大落，久经折腾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身为阿丹之妻，被折腾的我也就不仅仅是陪斗的了……

姜：解放前，你们演出进步的戏剧，拍摄揭露黑暗、向往光明的电影，您知道有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吗？您知道身边有共产党员吗？

黄：不知道。因为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和共产党员都是保密的，我不可能知道。可是，我身边有许多好人，他们事业心强，遇到挫折和困难，总是冲在前面。他们像大哥哥、大姐姐那样关心我，爱护我。解放后，我才知道，那些好人中，有许多是中共地下党员。

姜：解放前夕，电影界有许多导演、演员，去了香港。您和赵丹是否也想过去香港呢？

黄：我们没想过去香港。当时，香港有家电影公司请我俩去香港，待遇是除基本薪水外，每拍一部电影给赵丹两根“大条子”（金条），给我一根半“大条子”，可是我们拒绝了。在旧社会，我们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和没落，看到广大人民所受的苦难，我们诅咒黑暗，向往光明；我们期盼解放，并以实际行动在白色恐怖下，加紧拍摄电影《乌鸦与麻雀》，迎接解放。我们还悄悄听解放区的广播，悄悄唱：“山那边哟好地方……”

姜：我有时在想，如果你们去了香港，就不会经历那么多的苦闷和折磨，更不会遭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赵丹也许能拍更多的电影，还能快快乐乐地多活几年……

黄：如果，也许……生活里哪有那么多如果和也许。

姜：是啊，命运是不可能预料的。在命运的风浪中，最能考验人的品格和气节。遭厄运的人，会变得更坚强，更理智，更清醒。

黄：不幸的人，往往比幸运的人更懂得磨难和痛苦的价值。那是一种收获，任何财富都不能替代的收获。

姜：您曾经说过，从1958年开始，您的演员生活渐渐“淡出”，您的作家生活渐渐“淡入”。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您风里来，雨里去，有时踏着春光，有时踩着冰雪……写出了那么多的报告文学和散文。《特别的姑娘》、《小丫扛大旗》、《星》、《大雁情》、《小木屋》……您的许多作品，在读者中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文学艺术的范畴。这样的社会效果，您有预料吗？

黄：作家写什么，是有感而写的。社会效果不可能主观去预料。我的体会是：作家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生活的激流中，经受着火与冰的淬炼，和人民一起，切身感受到社会的暖与冷、欢乐与痛苦、幸福与劫难、光明与黑暗、美与丑……才可能换来色浓墨饱的一支笔，写出读者喜爱的作品。历史和时代，迫使我们心中凝聚着最深沉的爱与恨，这就是产生优秀作品的沃土。

姜：作家的作品，是离不开生活，离不开社会背景的。有许多作品受到过读者的欢迎，可是经不起时代的洗礼。就像一座雕塑，真实而又生动，却落满了历史的尘埃。

黄：是的。那是特定历史的所限，那是作家洞察生活目光的所限。作家的作品，都是作家的脚印，对也好，错也好，都不要掩饰。在上个世纪“大跃进”的年代，我在农村也如醉如痴地投入“大跃进”的热潮，三天修条路，七天开条河，为了放“高产卫星”，我和乡亲们一起，把已经灌浆的晚稻拔出来，往另一块田里拼命地挤，拼命地塞……我都意气风发卖力地干。这一时期，我写了不少歌颂“大跃进”的作品，而且都是真心实意写的。社会上刮“浮夸风”，作品里也刮“浮夸风”，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作家的悲剧。现在反思起来，心里还一阵阵剧痛。

姜：一部电影，一个话剧，一本小说，一篇文章……说它好，就说它对社会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推动了时代的前进；说它坏，就说它多么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其实，文艺作品的作用是有限的，过分夸大它的作用，也就失去了真实意义。

黄：文艺作品真有那么大的作用？能左右什么形势，又能推动社会发展……果真如此，中国只要多培养一些作家就行啦。

姜：演戏，拍电影，写作，办企业，做艺术监制，当电视片主持人……您都是全身心地投入，拼死拼活地投入。朋友们都说，您在艺术事业的追求中，每一步都留下了鲜明的脚印。可以说，您的天赋是少有的，令人羡慕的，而且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黄：我这一生，原本只想做一个好女儿、好姐妹、好妻子、好母亲，而这一角色却在个人机遇、民族兴亡中衍化出种种想不到的情节和变异。也许，我此生没得到发展的天赋是当个好主妇。

姜：1978年春天，您作为《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特约记者，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参加大会的科学家有5000多名，您怎么会决定采访“种野药的”林业专家秦官属？写出了报告文学《大雁情》……

黄：我觉得秦官属是一位生活在群众中的、朴朴实实的科学工作者。我国的知识分子，有共同的磨难，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命运。作家的责任和义务告诉我，应该从普通人中，找一找这一代科学工作者的缩影。秦官属这样的人，正是我在5000名科学家代表里，寻找了千百回的采访对象。

姜：《大雁情》发表后，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它道出了广大知识分

子的心声，呼吁有关方面要加紧落实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黄：可是，也有个别人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抗议，说我在文章中杀害了人，毫无根据地把秦官属捧上了天。其实，在写这篇报告文学的过程中，我是很谨慎，很小心的，有些问题我反反复复地思考，看到了现实，也想到了未来；涉及到的不仅仅是科学家的命运和前途，还有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被否定、被丢弃的人权问题。不然，一篇文章我不会从春天写到秋天。

姜：无论什么时候，一个正直的作家，总是要和他的人民一起付出代价的。

黄：是的。也许这就是作家的使命和光荣。我踏遍大江南北，结缘四面八方，就是想从切身感受出发，走向自己熟悉的或陌生的生活领域，从水泉里舀一勺新鲜的水，递给养育我的人民。

赵丹的遗言和他的艺术一样，长存在人们心中

姜：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您不是叛徒，不是特务，不是走资派，却被打成了“典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以伪装的革命面貌和语言，蛊惑青年和广大观众、读者的最危险的分子”。再加上您是赵丹的妻子，又成了无法辩解的“反革命家属”。您认罪吗？

黄：开始我想不通，经过七斗八斗，交代和反省，对照“最高指示”，对照“无产阶级专政”下具有权威性的中央文件与社论，我渐渐觉得自己确实比纯旧社会型的文艺人有欺骗性，只得低头认罪了。

姜：关“牛棚”，写交代，进“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在那样漫长、可怕的日子里生活，您说是但愿长睡不愿醒……

黄：那时，一睁开眼睛，就感到一种无法言传的悲哀和无奈：我干嘛又醒了？我为什么不永远地睡下去，永远不醒，永远不再看到、感到自己身处在这样的一个世界，这样一种境地！

姜：那样的境地，是后人无法理解、无法想象的。唉，那是阳光下的黑暗。

黄：认识了黑暗，也是一种幸福。

姜：听说，对“牛鬼蛇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还有人专门给“牛鬼蛇神”谱了歌，真是可悲又可笑。歌颂祖国的歌听过，歌颂党的歌听过，歌颂故